

一二、九运动感怀

—— 追忆我的父母王仁忱、黄肖兰

王竹

在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我来到北师大的校园，这是我父母年轻时曾经生活、学习、战斗过的地方。我的父亲王仁忱和母亲黄肖兰 1934 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并把魔爪伸向华北，中华民族处在危难之中。我的父母怀着不做亡国奴，拯救民族危亡的满腔热血积极投入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父亲去世至今已四十七年，母亲也已去世。想起他们虽历经风雨，但终生坚守信仰，真是感慨万千。

父亲生长于辽宁康平的一个农民家庭，在中学读书时受到他的国文老师影响，开始阅读五四以来进步书籍和鲁迅的文章，接受了科学民主的思想。九一八事变给了他这样的东北青年深深的刺痛。他在自传中写到“我曾经读过‘最后一课’，就像晴天霹雳一样，一夜之间，沈阳城头挂上了日本旗，我深深感到‘最后一课’的惨痛，我有着亡国奴不如丧家犬的感觉”，但他当时相信“中国决不会这样轻易地把东北让给日本”。当他得知北京有专门收容东北流亡学生的学校——张学良办的东北中学时，便在 1932 年夏，冲破家庭束缚，只身坐船入关，转道天津又到北京。但他看到的北京不是在积极准备抵抗日寇入侵，而仍是官员腐败，纸醉金迷的故都，这使他极其失望。父亲在思想苦闷和生活拮据中度过了在东北中学的学习。毕业后，于 1934 年夏考取了官费学校——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在那里，他参加了四年级学生梁寒冰领导的秘密读书会，学习了李达翻译的辩证唯物论教程，还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和介绍苏联革命的书籍，如“中国革命观”、“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大革命史”等，这使他思想更加开阔，在报国无门时找到了思想上的出路。

1935 年夏，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进攻，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北京危急，偌大华北已经放不稳一张书桌了。父亲在这时加入了秘密的民族武装自卫会（反帝大同盟）。他们夜间在师大校园张贴抗日标语，散发中共中央政治局

的传单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抗日传单。父亲还参加了水灾救济会，这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35年冬，大汉奸殷汝耕宣布冀东反共自治政府的成立。面对国土的沦丧、政府的投降政策，群情激愤，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形势下，北京青年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父亲是师大的代表。在十二月九日示威游行的前夜，师大的进步学生点着蜡烛在宿舍开会，准备集会游行。第二天清晨，父亲和其他领头的同学带领学生们冲破军警对学校的封锁，冲出校门，来到东交民巷，与各校游行队伍会合。随后，游行的队伍向西进发，师大的队伍最先冲到新华门。当时军警林立，野蛮地用皮鞭棍棒殴打学生，用水龙头喷射学生，但学生们豪不畏惧，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投降政策，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口号。第二天，全市大中学校举行大罢课。十二月十六日，全市发起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斗争取得胜利，影响全国。那时父亲由黄敬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党组织派他担任师大的党支部书记。除此之外，父亲还参与发起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在其中担任宣传工作；在南下扩大宣传团沿平汉铁路的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和为牺牲的爱国学生郭清举行抬棺游行等活动中，父亲即使遭到反动军警鞭打，仍奋不顾身，冲在前面。父亲在这场运动中不仅是组织者，而且积极带头，冲锋陷阵，成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师大期间，父亲为地下党组织的扩大也做了许多工作，发展了不少党员。在文革接受外调时，他口头提到的就有二十多名。如赵德尊（原黑龙江省委书记）、于刚（原中央统战部付秘书长）等。1936年春，组织派父亲到中共西城区委担任宣传委员，在那里，他与区委的同志日夜紧张工作，领导着全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从我的叔叔口中得知，父亲参加革命后，在给家人的信中说道“我参加了、、、、、、，穷人要翻身，中国要解放，日本帝国主义早晚要被赶出中国。”这信被日本宪兵队扣查，爷爷和叔叔被抓去遭到毒打，父亲也因此与家乡失去联系，有家不能回，这更增加了他的家仇国恨。

我的母亲黄肖兰是广东人，她的父亲是孙中山时期的爱国民主人士。母亲从小学习优秀，十七岁高中毕业便由广东省保送到北平师范大学，与父亲是历史系同学。母亲也积极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并担任中共北平西城区委机关的秘密工作。父亲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热情感染影响着她，她在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他们家庭背景不同，但抗日救国、追求真理的共同信念和目标使他们走到一起，结为伴侣。

七七事变后，父母转移到湖北、湖南做党的地下工作，主要办进步刊物。后来由于白色恐怖，环境恶化，则辗转在南方各地学校教书。他们以教书为职业上的掩护，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介绍苏维埃社会主义和抗日救国的革命思想，扩大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原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张玫在青年时期受到父亲的影响和引导，后来参加革命，并与父母结下终生友谊。又如桂林的汉民中学，父亲的学生秦芳珍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父亲“讲课满腔热忱，慷慨激昂，总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阐述历史发展，给同学以正确认识”，还辅导他们读鲁迅的书，“苏联建设丛书”等；带他们去看进步话剧，为他们讲解剧中主题思想，启发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有不少学生由此而进步，走上革命道路。再如解放前夕，广州执信女中的杜凤珍在父亲和母亲的影响下（当时母亲是她的班主任），接受进步思想，逐渐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考入北京大学，后来任北大俄语系的党总支书记。父母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每到一校，由于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当局的追捕，学生们总是设法保护，帮助他们脱险。1949年春，在中共华南局的帮助下，父母乘香港至天津的第一班船回到日夜思念的解放区。临行前，执信女中的学生到车站送行，唱起“你是灯塔”这首歌颂共产党的歌曲。全班同学在红绸上签名留念，并派同学护送他们到香港，以躲避特务追踪。学生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同学们含着泪水到广九火车站送别了我们敬爱的革命启蒙老师，虽然他们已北上去了解放区，但在同学们的心田里已埋下革命火种。50届同学个个追求进步，在建国初期，踊跃参军参干，其比例之大，为同期广州各校的前列。”当我看到当时留下的照片，不禁被在艰难时代父母与学生之间的至深感情而深深打动。

解放后，父母在天津教育界工作。父亲在五十年代前期先后任女二中校长，市一中校长，1953年调到天津师范大学，后改为河北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校党委委员，为历史系的发展，教学质量的提高和科研工作的全面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任天津历史学会副会长，《历史教学》副主编。1956年，他代表我国去波兰讲学。他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发表过多篇论文并主编《中国近代史》，在史学界有较重要的影响。父亲在工作中注重培养青年教师，在左倾路线

盛行时期，他冒着被扣右倾帽子的风险，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主持公正，保护有学术水平、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如漆侠先生，他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宋史研究专家。在文革中，父亲遭受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蒙受不白之冤，身患重病，于1968年3月去世，年仅56岁。1980年7月，河北大学党委在天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为他平反昭雪。天津市委、河北省委和人大常委会的有关领导同志及史学界的专家参加了追悼会；父亲在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北师大同学和战友于刚、林一山（原水利部部长）等送了花圈。

我的母亲在解放初期受党委派接收当时在天津的法国教会学校，后改为天津女四中，是市重点中学。母亲担任校长三十余年，为学校的发展和培养人才付出了全部心血与精力。母亲也在文革中遭到批斗关押，但她相信党、相信群众，终于度过难关，在文革结束后，恢复了原职，她不计前嫌，团结同志，在晚年仍发挥余热。天津市委在建国五十周年，六十周年给她颁发了纪念章，中央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也给她颁发了纪念章，并给予她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待遇。

父亲常对我们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对党肝胆相照。正是这样，父母无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在国统区的白色恐怖下，还是在政治运动中蒙受冤屈时，都坚信党，一生自觉地将党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事业，无怨无悔。改革开放后，母亲的待遇条件都得到提高，但她一直生活节俭，也不允许子女以公谋私，而在支援灾区时，她总是第一时间捐款捐物，她认为这是她必须带头做的。周恩来总理逝世时，她异常悲痛，苏联解体时她十分痛心。父母对党对革命的真挚情感，他们的品质和人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人生道路。

今天，站在北师大的校园里——这里是教师的摇篮，也是父母革命起步的地方，我不禁想到那句名言：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教育的真谛是塑造人。父母用一生的奋斗见证了这句话。北师大教育培养了他们，他们又引领了更多的青年进步、成长。

今年的十二月九日是那场伟大运动的八十周年纪念日，她在北师大的校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国家和人民将永远怀念为抗战牺牲和作出贡献的先辈，我也会在北师大校园中的一二、九运动纪念碑前为父母和与他们共同战斗过的同学们献上一束鲜花。

注：文中有关学生的引文选自桂林汉民中学校刊和广州执信学校的校史纪念文集。

